



海 寧 文 史 資 料

第 期

94

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谨念先师朱起凤先生

马君松

朱丹九先生，讳起凤，世居袁花，为名医朱杏伯先生之后。

先生系新仓吴浚宣紫茶翰林的外孙。幼从外祖读。长住新仓。与我舅父朱春如公极友善，可能是同年进学，时相过从。我到外祖家作客，几乎天天可以碰见。

我在家塾读了四五年，考进海宁“官立两等学堂”（其时为满清光绪末年。校长陈吉堂先生，每星期一、来校上“修身”课，还是穿马衣外套、领顶辉煌。他是举人，也称孝廉公）。海宁还是“州”，而不是“县”，即今“盐官”。

读了一个学期，舅父认为路远而交通又不便（我家在马桥，距盐官约四五十华里），要我改进硖石“米业两等学堂”，其时朱师在米校任国文、历史教员。舅父写了一封信，叫我带去，请朱师多加照顾。

其时，米校开办的第一班级将毕业。先生所教，为《诗经》与《古文观止》，历史已用商务版历史教科书。第一班同学有骆何坤（后改名何竞武）、马锡武、张志元、程大均、谈鸿藻、米文焘、宋云彬、唐兆寅等共十余人（姓名已记不全）。

先生于清末迁住硖石方便弄，后迁东关厢外蒋宅。开始写《叠测篇》，即《辞通》初稿。在蒋宅改名《读书通》。有暇，手不离笔，稿纸满几床，在蒋宅卧室，悬一副门联，上联辞句，已不复记忆，下联是“等身著作读书通”。

《读书通》后由上海开明书店印刷出版，改名《辞通》，两大厚册，与商务《辞源》、中华《辞海》并驾齐驱。如此巨著，出于一人之手，世所罕见。

当时清政府腐败已极，丧权辱国，民不聊生。每天《上海日报》一到，必先行读长篇时评，辄多谴责，不予宽容。爱国热情，超乎人上。授课时，每每借古喻今，愤怒痛斥权奸误国，生民涂炭。

他对满清滥杀无辜人民，切齿痛恨，要我们记住这个深仇大恨：如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。“嘉定三屠”之后，又有几起“文字狱”，如吕留良、查嗣庭、沈归愚等案，毁墓戮尸，被屠杀者，数以千计。尤其是以徐锡麟、秋瑾诸革命烈士之临危不惧，慷慨就义，甚至有些细节，也详细谈及，如徐锡麟临刑时，穿一件汗衫，外罩官纱背心，活活把尖刀望胸部插进去，把跳动的红心挖出来，祭供恩铭，再把心煮来下酒。他说：光复后绍兴为徐烈士开追悼会，只有一副挽联提及此事：

转眼便复河山，想烈士黄泉，了无遗憾；

此心可对天日，借权奸白刃，剖示同胞。

光复初，满清犹作垂死挣扎，妄想死灰复燃。民国政府号召组织“学生军”，

总部设在南京，朱师亲率第一班部分毕业生，如骆何坤、马锡武、张志元等到南京参加。后来学生军解散，骆何坤到保定进军校，改名何竞武。

这一年，城里（盐官）组织商团，防御盗匪，保卫商业。某日在东门外海面上发现海盗抢劫货船，商团立即下海追捕，在战斗中有三名商团团员被海盗杀害，一为庞姓店主，其余二人为商店职工。在海神庙（庙宫）开追悼会时，米校应邀参加，出席师生四、五十人。临出发时，发现没有挽对，朱师说：“快去买两丈白布来！”挥笔立书如下：

三子者不同道其取则一

大丈夫疾没世而名不称

先生对于制楹联甚感兴趣。我弟景洪曾于旧书堆中，搜到一本先生制作的楹联清稿，系先生亲笔小楷，约有两百以上的长短联，包括闲适、空灵、自然奇巧、哀挽、祝贺等等。我烦蒋雨田先生录副，将墨迹原本赠于吴文祺同学。物归原主。

硖石“朱氏义庄”落成，主持人请先生题一副抱柱对，而且要请先生书写，以便刻木永存。一天，先生忽然给我一卷宣纸并联稿，说：“这出戏要你冒名顶替一下，我实在怕写大字。”我瞠目不知所对，先生已与其他朋友谈天去了。

这样重任，我如何敢下笔，不知不觉，十几天过去了。一天在街上碰见，他说：“你到底肯写不肯写？义庄催我好几次了。”我没有办法，回家就写。自知根底浅薄，心情紧张，写得一塌糊涂。

这副联语，上联末脚是：“白鹿洞”，下联对“紫鹄湖”，我问先生：鹄湖上加“紫”似乎没有见过。他说：“积非成是”，地名变易甚多，“西子湖”现在都叫“西湖”了。此谜至今未解。

1934年，我为上海亚细亚书局编辑《青年基本知识丛书》。其时先生在上海中华书局编《辞海》，我请他写一本《字类辨正》，与茅盾所著关于欧战问题的两本小册子同时出版。《字类辨正》初版，一上市即售完。茅盾所著的两本，为书报检查所阻，未能出售。

日寇侵华，先生迁回硖石东关厢外蒋宅。每天午后，在“同福园”茶室闲坐清谈。人有请其代拟喜庆哀挽类联额，无不立时应付。有时手头无纸墨，就在香烟包皮纸上、或翻转信壳、用铅笔头立写以应。从未取酬或延约。代人鉴别书画与古物，识与不识，一言立决，不作游移两可之词。

其时，许志行兄与夫人瑞瑜借住南关厢外吴敦先生老宅。春节请先生小饮，邀我作陪。四人酒酣耳热，畅谈童时事，先生曾戏弄启蒙老师，使他啼笑皆非，相与大笑。

先生七十岁后，被本镇沈公信绸庄主沈仰高君延聘为西宾，优待逾恒；无常

课，遇有疑难典籍，恭聆教益。沈君家宅富裕，好学不倦。能唱昆剧。围棋、象棋，都属能手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浙江民盟主持人查人伟（诵坚）到硖石探望朱老；仰高兄请客。畅谈中，我以访得香粳米五斗为奇遇。朱师拍手赞叹，我充分奉二斗。下一天早上，沈家遣佣持包来取。并交一函，系先生亲笔赠诗一首：“十年不吃香粳米，蓦地闻名喜欲狂；我亦修文门下士，今宵隽味快同尝。”

先生到沈宅后，因为清闲无事。每天仍去“同福园”饮茶。先生记忆力特强，所谈都属诗文掌故。一班门生故旧、百听不厌。分析世界大势，尤多精辟、中肯，旁及小品幽默奇闻之类，无不引人入胜，皆大欢喜。

清朝末年，旧文化虽已成强弩之末，但一些老文人，还是“君子不忘其旧”，弄弄笔头，在报屁股上，不断有征诗、征文、诗钟、灯谜等游戏文字。

先生对外祖吴紫茶太史，非常尊敬。一次新春灯谜会，先生请他参加。太史写一“日”字，请打《唐诗》一句，原来的谜底是“明月来相照”。有人猜：“明月自来还自去。”问太史对否？太史认为比自己拟的谜底还要好，便说：“对！对！对！我从今不再制灯谜了。”先生说：“太史的谦挹可见一斑。”

先生记忆力之强，令人惊服。有人以极俗的四个字“张三李四”嵌字格为题征答。有以极雅的四字嵌成为：“四壁图书三尺剑，半肩行李一张琴”得第一。

有如孙玉声所作：以象棋子名，对“天九牌”牌名。

又如，硖石徐、吴两姓为婚姻纠纷而入讼，以致女方自杀，朱苓年先生一联：“三生未订鸳鸯谱，一死聊平鼠雀争”等，先生说来娓娓不倦，听者忘归。如能随侍记录，可能成为厚厚一本好书。

在仰高兄家的几年，可能是先生一生的清福。抗日胜利后不久，仰高兄患伤寒逝世。临危时叮嘱伊夫人：不让朱先生回去，要照样供奉。但先生总觉郁郁不乐，无以为欢。挽以长联，表示深切的悼念。联曰：

春风风人，夏雨雨人，平时胞与为怀，古道照人人竞仰。

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此日容仪顿杳，衰龄剩我我何堪！

光阴如箭，好景不常，先生病逝于沈宅，移东关厢旧居大殓。文祺、云裳及时奔丧，哀痛逾恒。

郑振铎、叶圣陶及京沪友好，中华、开明同人，都有挽辞挽联，深切哀悼。

先生享寿七十五岁。葬于东山万石窠，与诗人徐志摩葬地为邻。

先生有两子两女：长女适硖石蒋庆荣，长子文焘未婚病逝，幼女文昭、适海盐陈氏，次子文祺病逝美国。孙儿女都在上海及美国。

《辞通》的出版

章克标

现在大家喊“出版难”。其实，出版向来是难的。旧时中国很多文人、学者的著作，大多数难以印刷出版，而只是手稿和以钞写本的形式来存在和流播。有些稿本在作者谢世后多时，才由热心人为之刊印成书的，只是少数的幸运者。始终没有能刊行而归于湮没的，当然要更加多些。

印刷成书，先前是用木版的，要有板材的木料、刻字雕版工、墨液及印刷工、还有摺纸整理装订工好几道程序，必须有相当的资力。文人除少数在朝堂为官作宰者以外，一般都清贫，如无热心人出资帮助，就难出版。有了铅字活版印刷之后，印造书册比较省力了，但还是非有一定的财力不可。现在大家喊出版难，毛病也是资金缺乏。真叫“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但要办件事，没有金钱又万万不能的”。从朱起凤的《辞通》出版印行经历曲折，也可以作证。约略记述之，以为纪念朱先生诞生 120 周年的点缀，幸读者多多指正。

1918 年，朱起凤把他十多年来搜集的材料整理、排比、编次、缮写成书，取名叫《蠡测篇》。后又改名为《读书通》。他携带此书到上海谋出路，并请当时的学者、通人指教鉴裁，得到普遍赞许。当时就有两家富室大户愿意出钱收购这部稿本。其一是上海有名的大富翁犹太人哈同。他建了宏大美好的爱俪园，俗称哈同花园。在园内办有学术机构及学堂，如仓圣明智大学及广仓学馆。还请了王国维编辑《广仓学馆丛书》及月刊《学术丛刊》，以此来附庸风雅，结交学者文士艺术家，以谋求更好的名望。大学是哈同的门下姬觉弥主持的，对于朱起凤的此书很感兴趣，认为有利用的价值。其二是湖州南浔富家刘翰怡，就是有名的“嘉业堂”藏书楼的主人，也是爱好学术、欢喜刊书藏书的人。不过这两项交易都没有谈妥。大约因为朱起凤心中是着重在出版印行，而他们买了书稿去之后，便未必能用朱起凤著作的名义来出版，所以不得成功。事后，也有人替他拿到商务印书馆去试试，也没有被接受，大约因为该馆的《辞源》一书刚出版不久，自然不要这种相类似的著作。朱起凤这一次的尝试，以失败告终。

当然，朱起凤也不至于因为出版不成而放弃了他的研究。回乡之后，仍然继续这项工作，虽然生活清苦，还可以去米业小学堂教书来维持生活，在多余的时间里仍然孜孜矻矻，阅读能得到的古籍，仍然钞摘材料，以备扩充此书，使其更加完整。这样又经历了好多个年头，他就能把这书又大加修订，增加了大量新的材料，又作了审慎的规划和分析，对于每个条目详加案语，说明其间的相通、相同，或是谬误、或者有无变易的经纬缘由，比初稿大为扩充，质量也有所提高。又因前人已有过《读书通》的名字，因而改名为《新读书通》。

1925 年，朱起凤的儿子吴文祺在上海工作，乘便又把此书稿拿到上海去求

出路。吴文祺托郑振铎把此书再送到商务印书馆。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王云五，只把这部厚厚大书翻了翻，不到几分钟，就决定不接受，把原稿退还了。后来，又有人介绍给南京中央图书馆，他们表示可以收买，但又说是不一定能出版，所以也没成交。

当时上海有好些人，对此书难以出版，觉得可惜。吴文祺的一班朋友，也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奔走号召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，大声呼吁，广为宣传介绍。其中朱起凤在米业小学教读的学生中有个宋云彬此时也在上海，协同吴文祺一起出劲宣传，大造舆论。宋云彬写了一篇题目为《一部未出版的伟大辞书》文章，刊登在孙伏园兄弟二人办的《贡献》月刊上。上海有个文人许啸天读了此文，就怂恿“上海群学社”承印此书，他们并与朱起凤签订了出版契约。这样，此书首次得到了印行的机会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可是事情也难以一帆风顺，因为此书中生僻奇字太多，一般的印刷铅字，没有字模就不能浇铸铅字，排版起来缺字太多；而每个缺字都得用人工手刻，不胜其烦，而且工作量大，成本就要提高不少。由于这个技术上的问题，难以解决，出版社打退堂鼓，最后只好双方协议，解除了这个契约。出版又成泡影。

1930年，吴文祺为促进这本辞书的出版，再作努力，编印了一本宣传的小册子《新读书通说明书》，详细介绍该书的内容；并搜罗以前发表过的许多宣传、介绍的文章汇总在一起；又选录该读书若干条目，作为实例，以昭示此书的内容。他用铁笔刻蜡纸，油印了百来份，分别寄送给有关方面及学界朋友，敦促各方面协助设法出版。同乡人徐志摩曾拿到中华书局编辑部，进行游说，朱宇苍也拿到了福保的医学书局介绍推荐。（丁福保出版古籍，很有名气，那部著名的《前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就是医学书局印行的。）都因为生僻字太多，排印有困难，没有能成功。

正当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之际，得来却又全不费工夫。其时宋云彬在新开的开明书店打零活，为开明活页文选作选题及注释、校对工作。因而在开明算半个编辑，同开明书店的人自然有往来。一天开明书店的编辑徐调孚（乍浦人。家学渊源，极爱好古典文学），到宋云彬寓所来串门闲谈，看到了这个小册子，宋云彬就讲了这书的出版屡遭挫折的情况。徐说：“我看，这书可出。我去同章老板商量商量。”徐调孚回开明书店后，就同章锡琛和夏丐尊谈了此事。几个人包括叶圣陶在内，商量的结果，觉得该当出版。再同宋云彬说了，把原稿拿来作具体研究，经过考虑之后，章老板拍板决定接受，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此书。并请宋云彬跟他的老师、著作人朱起凤联系，请老人家到上海来协商具体办法。朱起凤老先生因此就到上海一行，由儿子吴文祺陪同一起和开明书店负责人协议，讲好条件，决定把书稿出让给开明书店印行。至此出版才得以实现。可说是机缘凑巧，也有

点天运的味道。具体办法，由开明书店付给一次稿酬 6000 元，买下了著作权。而开明书店要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出版发行。有没有要赠送著作人样书若干部，好景并未讲定，以后有没有赠送，我也不明白。此书得以出版，总是好事。

关于编辑校对方面，因这本书里有关小学训诂方面的术语多，所以开明又商请宋云彬正式进了书店工作，专门负责此书的出版事宜，担任编校工作。宋把此书重行厘订编次分为 24 卷，又商得作者同意，改名为《辞通》。又请了几个名流学者作序文介绍推荐，由他们所经营连枝机构美成印刷所排印。这样努力工作了三个年头，到 1933 年，此书方正式出版，与广大读者相见，朱起凤出书的心愿才告实现。作序文的人是钱玄同、刘大白、林语堂、程宗伊等人。

朱丹九先生趣事琐记

——朱丹九诞辰 120 周年纪念

高健行

诗人徐志摩原墓葬地，在海宁东山南麓，小地名唤作万石窝。该处万石嶙峋，芳草鲜美；登临眺望，横塘水漾，确是个好地方。就在徐墓左近，雅称小赤壁之处，峭壁环合，有一隙地，“文革”前尚存 1 米见方水泥坪，中线稍隆寸许，呈土瓦状，前竖尺半长一条劣质方石，朝南一面，歪斜浅刻数字，仔细辨认，赫然显示：“文字学家朱丹九先生之墓”十一字，下署郭绍虞之名。“文革”浩劫中，竟连如此简朴的石碑也已被挖走，一代鸿儒、著名训诂学家几被人间遗忘。朱丹九先生的学术成就自有学界公认，笔者谨录其趣闻轶事数则以资纪念。

当年《辞通》出版大功告成，他曾受聘于商务印书馆设专柜，人称“活辞典”。朱丹九先生高高端坐。彼时沪上诸多年轻作家，才气横溢，颇多不服。一天聚集数十人，检一生僻怪字发难，朱戴老花眼镜一眯，微笑解答：“此字读某音释某义，如何？”汨汨然滔滔然，疏释良久。最后复言“此字在余编纂之《辞通》第几页第几行，尔等自可寻去。”其强记博闻令人叫绝。围观众人目瞪口呆，无不拜服。

先生晚岁清贫，与邑中徐菊庵、许葆翰、徐荅初诸老唱酬不绝。其中与笔者先祖相与最得，余先祖申录公少十岁，却与之有共裘之美。朱丹九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，竟以其珍藏的《泾川朱氏家谱》贻赠留念。人能以自己祖宗家乘相托，足见情义之深。

先生生前居住在硖石东关厢外，群恩路口，棋子桥堍。临水望山，柳树成荫。起居得邻里照拂。芳邻中有一姓宋的年轻人颇能书，常为乡人写春联、挽幛、喜轴之类。每逢拟句、含义或文字工仗，都向宋老求教。朱便摸索身边老刀牌香烟壳，翻转题写，流畅利索，从无一笔顿挫。邻人则携酒食小谢之，甚为得趣。邻人之六七龄小儿天真活泼。忽一日抱朱家爹爹膝下，奋小拳嚷道：“我爸爸学问比

你好，为啥不见别人求你写对子呢？”大人们闻之失色，连声呼小子无知，该打该打。朱老则不以为忤，一如既往，抱小儿膝上，喜逗益乐。

先生晚年生活很简朴，也很有规律，每天早上，几乎天天去硖石镇上西山惠力寺前、西寺桥南境的宜园茶室吃早茶。下午，间或去石路顾厅或三和馆书场听书。宜园是硖石宿学、商绅们共聚的好地方、乡土味浓烈的茶馆。有的人连每晨的洗脸漱口也在此店中解决。朱丹九、高申录两位便是这样的老茶客，他们总是坐在靠里边固定的一隅，连茶壶茶叶也是自备在店中的。除了品茗、听新闻外，也闭目养神。座中最富贵的乡绅，后来推到徐志摩尊人申如先生名下。茶馆中早点是面店小厮送来：方糕、塌饼、鹅头颈则是小贩托盘进店兜售的。此中称为崭货绿豆糕的尤为上品。面食中虾仁拌面虽是乡里名特俏货，但对老人们已渐觉太油腻了。

那些在外边发迹衣锦还乡的人，也总是在回硖石的第一个早上就来宜园“报到”。便可省了去各位乡亲父老府上一一拜望，与熟人均可碰头。连外部世界有人来，也都极愿陪来宜园介绍给众乡亲。当年胡适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，曾到石硖石向徐老太爷进劝，小住两天。徐申如陪胡教授到宜园吃茶。胡适是大名鼎鼎的。茶博士碰到这“洋博士”，自然分外殷勤。终于求得胡先生挥洒一通。题写的墨宝，据说是录汪容甫赠家乡一茶馆的妙对：“一间东倒西歪屋，几个南腔北调人。”（其实硖石宜园堂皇得多，这旧屋至今尚存于张宗祥纪念馆左近。）这下子成了小镇上三日三夜“热点新闻”，茶室书场、酒馆增添了火爆谈资。朱丹九与胡适早已熟识，自然有一番应酬。乡民旁观便瞠目结舌，因为连胡博士也拜服朱老夫子的渊博，认为“朱先生是一个有方法、有创见的学者……给了我们许多训诂学方法的教材。”胡适离硖后，茶室中有人对朱丹九说：“洋博士在外边研究十分宏富，你‘窝’在这里硖石小地方，能做什么研究呢？”他便开玩笑答道：“我讲给你们听，你们也听不懂，自然只好不讲了。”茶客中有的熟人便故意激他：“胡适才是真博士、研究家，你有什么可吹的？”朱丹九拗不过众口，就随便说了个笑话。他说：“硖石口音听似相同，然而循音韵训诂之学深究，可大有学问哩，你们信不信，小镇东南河与西南河两条街，便存在两大‘语系’……”“不信，不信！”众人有意再三激他。朱老夫子只得娓娓道来：“譬如西南河人讲这几句话：‘杜寒桥（又名大瑶桥）头一只船（音才 cái），船老大手里捧只碗（音弯 wān），碗里相一只虾（音孩 hái）。’到了东南河居民口中则变成：‘芦菲汇浪一只船（音传 cuāi），船老大手里捧只碗（音宛 wǎn），碗里头一只弯转（亦乡俗对虾的别称）。’”听得众人大笑不已。见朱老夫子当日特别兴奋，肯说笑话，有人便乘兴追问他：“胡适是徐志摩好朋友，十分推崇志摩新诗，你会不会做新诗？”朱丹九在情绪亢奋中说漏了嘴，便胡诌出两句调侃：

“毛家祠堂里向一缕烟，冲到天际就不见。”

众人听了一阵轰然大笑。幸亏正好徐申如不在场，否则不拘小节，是有伤大雅的。但朱老的风趣说笑，永留在乡人的记忆之中。先生逝世后开丧出殡，轰动小镇，穷街僻巷，素车白马，塞衢阻巷。无论是穿西装革履或制服长衫，拱立两厢的，尽是高朋执友，或他乡桃李。当年硖石镇长以师生名义，执哭丧棒、披麻重孝前驱开道，以为荣耀。墓葬颇整肃。

近年，朱氏《辞通》业已重新再版，不知故乡文化教育各部门有否收藏珍庋。

后记：

为了纪念著名学者、训诂学家朱起凤先生诞辰 120 周年。承凤老高足、九九高龄的马老君松先生暨老作家、九五高龄的章老克标先生二位人瑞执笔“三亲”史料，弥足珍贵。并承高健行先生惠稿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编者

朱起鳳先生手迹

我愛吳季子，飄然思不羣。卜居溪山裏，

何處是塵氛。義是長安樂，長安不易

居。此間佳趣足，焉弗賦歸歟。秦王磨

劍石，殿以讀書基。世稱雄傑而今安

在邪。先生以峯秀爲主，三窟門辰

昏曉宜省，一側獨與孫。辛巳孟三月

慎諸先生以六峰環繞園索額亭

成佳句，銘王叔正。朱起鳳稿